

當我們不僅是為了找工作而學習

施宥丞 (Munus , 工科系 20 級 , 現為紐約 Pratt Institute 助理教授)

我一直覺得通識教育 (liberal arts) 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概念。有一本我很喜歡的書 *A New Program for Graphic Design (2019)* 由美國設計師 David Reinfurt 撰寫，書中整理了他在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多年教授平面設計課程的經驗。有趣的是，普林斯頓並沒有平面設計系。這些設計課程原本是為其他創意科系學生開設的選修課 (例如建築系) ，後來也逐漸吸引了來自電腦科學、社會科學、哲學等其他背景的學生註冊。

這些學生大多不會成為平面設計師，不是為了掌握一項技能，為了畢業後的求職去學習，而是單純對於「什麼是設計、為什麼設計」這些問題充滿好奇。由於在此之前的課綱，平面設計多被傳授為一種「技藝」而非「學科」，因此 David 在重新規劃課程時感到非常苦惱。要怎麼規劃一堂設計課程給不會成為設計師的學生們呢？

David 後來決定把設計作為一種通識教育 (Design as a Liberal Art) ，他認為這些學生要學習的不是技能本身，而是把平面設計當作一種「識讀 (literacy) 」能力來教授。讓學生閱讀史料、參觀博物館、進行辯論，也實際透過練習設計去反思：什麼是設計？設計和其他創意學科有何不同？設計如何被制度化？誰有資格定義什麼是設計？誰又能定義規範什麼是好設計？

這本書讓我開始回想我大學的學習經歷，並研究通識教育在歷史上如何出現，又是為了什麼意義而設立？在西方大學的脈絡裡，通識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古希臘羅馬時代自由人 (liberalis) 的教育理念。在中世紀時被制度化為七種學科，其中的三學 (trivium) 教授文法、邏輯和修辭，讓學生學習如何閱讀和分析文本、理解複雜論證，並提出有說服力的觀點。起初這些教育受到教會大力

支持，目的是幫助修道士與學者準確理解聖經，並透過辯證傳播福音。但隨著文藝復興和人文主義的興起，這些批判性的思考訓練反而促成了對權威、傳統與教廷教義的質疑，並為後來的宗教改革種下革命的種子。換句話說，通識教育一直以來就不是為了職場所做的訓練，而是提供一套讓學生能提出問題、質疑既有制度與權威、反思世界的工具。

我在清大時唸的是工程相關科系，系上主要專注於學習專業技術，目的是培養更多能直接進入產業工作的工程師。對於為什麼要學習科、工程，這些研究對社會、經濟、政治、道德的影響就幾乎沒有觸及。當時我經常感到困惑——身為相關科系的學生，我被期待對科學與科技相關的社會議題，有比一般人更深刻的理解和批判的思維，但我事實上對自然科學跟人文科學的分別？科學方法和社會決策的假設與前提？都沒辦法好好的回答，更別提探索複雜政治面和議題面的討論。

那時候是通識教育給了我這個空間。清大的通識規劃，讓我自由地在既定學分內去選修哲學、美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等課程，去探索那些我認為在高等教育學習科技的人，本該知道的根本性的問題：知識如何被界定？是什麼讓某些學科被認為是「科學」？人又為什麼要學習？其中吳俊業老師開設的存在主義、美學；黃令名老師的技術史與技術研究（STS）課程激發並滿足了我的好奇心，也幫助我形成對科技與社會的批判性視角。它們不在我工程學院的必修課裡，卻讓我得以建構自己對於知識、科學與道德的觀點和論證，思考更深層的政治與社會問題。

通識課程對我來說最寶貴的一點，就是它在專業學科之外提供任何人辯論和討論的空間。就像 David Reinfurt 的設計通識課一般，這些學生不需要以成為哲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或經濟學家為目標，也可以和來自不同背景的同儕激動辯論人工智慧、科技倫理、思想實驗的議題。這種跨領域的學習經驗，最終促使我追求批判科技與技術研究的道路。現在，我在紐約的藝術研究所教授批判科技史，帶領學生從學習編寫程式、製作互動體驗到批判思考演算法的偏見、倫理議題，

創造美學、功能性兼具，且有倫理與社會意識的作品，把我當初在清大學習的專業知識和通識思維整合到實際教學和研究中。

我非常感謝在清華選修通識課的機會。通識教育是我改變思考方式、拓展視野的重要經驗。也許當我們不僅是為了找工作而學習時，學習才變得有趣、知識才能觸類旁通，用跨領域的經驗回饋社會，成為更好的公民，成為更完整的人。